贸易与国际关系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授课教师**贺平 研究员（[heping@fudan.edu.cn](mailto:heping@fudan.edu.cn)）

**目录**

[第一讲 导论：探索贸易与国际政治互动的机制 2](#_Toc209685582)

[一、研究贸易与国际政治互动的意义 2](#_Toc209685583)

[（一）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机制 2](#_Toc209685584)

[（二）国际关系中的贸易因素 3](#_Toc209685585)

[二、贸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 3](#_Toc209685586)

[三、贸易政治学的研究框架 3](#_Toc209685587)

[（一）双层博弈理论 4](#_Toc209685588)

[（二）国际关系中的“刺激/冲击-反应”模式 5](#_Toc209685589)

[第二讲 贸易与新现实主义 5](#_Toc209685590)

[一、现实主义权力视角下的国际贸易 5](#_Toc209685591)

[二、贸易与霸权兴衰 5](#_Toc209685592)

[（一）霸权稳定论的提出背景：大萧条 5](#_Toc209685593)

第一讲 导论：探索贸易与国际政治互动的机制

2025.9.11 / 2025.9.18 / 2025.9.25

贸易，在各种经济活动形态中，是最古老、最原始的一种，它产生于货币之前，在以物易物的时代就已存在。在虚拟经济大行其道的今日，物质形式货币逐渐退出舞台，但贸易依然不可或缺。

贸易也是最动态、最平凡的经济形态。它不但瞬息万变，而且相比金融而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贴近。

贸易还是最基础、最核心的经济形态，同时又具有反复性。例如，我们今时今日所常提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贸易。

一、研究贸易与国际政治互动的意义

（一）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机制

所有的政治都是国内政治。

——托马斯·奥尼尔，*All Politics Is Local: and Other Rules of the Game*

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经济。

——彼得·杜拉克，*Trade Lessons from the World Economy*

国际政治或所谓外交，其根源都在国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与反映。在当今全球化的时空背景下，经济的运行也无法脱离国际因素。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指出了国际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三组关系：

* 国内经济与国际政治
* 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
* 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

此处并未提及“国内政治与国内经济”，是因为这并不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以国内经济政策影响国际政治的案例诸多，如所谓“总统经济学”——美国的罗斯福、尼克松、里根、克林顿、特朗普等人的经济政策都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日本的吉田茂、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的不同经济政策也影响着区域乃至全球政治。就事件而言，上世纪的美国大萧条作为国内经济事件不但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而且继而蔓延到了政治领域，使一些国家采取了相对不友好的对外政策；欧债危机源于欧盟内部分国家的国内经济危机，但随之扩大为欧洲区域问题甚至是全球性问题。

琼·斯佩罗提出了国际关系中政治和经济互动的三种形式：

1. 政治框架制度决定利益分配；
2. 国际政策决定过程中的政治意图和经济利益相互影响；
3. 国际经济关系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关系。

后两种形式都比较容易理解，这里主要解释第一种形式。例如，日本作为典型的农业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其农业贸易保护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农协；日本的民主制度下，自民党的一大票仓就是农村，因此保护农民利益长期是自民党的施政主张，推行农业贸易保护也就顺理成章。

（二）国际关系中的贸易因素

有学者提出了世界的三种逻辑：经济逻辑（包括贸易、生产和投资的结构）、政治逻辑（关于世界如何组织、资源如何分配的竞争）、知识逻辑。我们在世上观察到的“经济现象”（economic phenomena）包括“与经济相关的现象”（economically relevant phenomena）以及“受经济条件影响的现象”（economically conditioned phenomena）。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方法与内容多有交叉：

|  |  |  |  |
| --- | --- | --- | --- |
|  | | **内容** | |
| **经济学** | **政治学** |
| **方法** | **经济学** | （1）传统经济学理论：市场环境中的最大化行为、价格理论、配置效率 | （2）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公共选择 |
| **政治学** | （3）政治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市场环境中的“权力—分配”分析 | （4）传统政治科学：政治场景中的“权力—分配”分析 |

二、贸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概念，主要有两种形式不同但实质相似的表述。

*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lpin）的综合说：**IPE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研究。
*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分析框架说：**IPE研究影响到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以及这些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是研究国际关系中政治和经济互动的新型学科。

斯特兰奇认为，IPE的基本价值观是**安全（security）、财富（wealth）、公正（justice）、自由（freedom）**。贸易与这四项价值观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财富**的保值增值是贸易的重要目的；贸易中有**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之分。贸易可能损害**公正**，也可能促进**公正**——三角贸易显然是对非洲人的不公正对待；世贸组织的反倾销措施则尝试维护公正的世界经济。毒品贸易、器官贩卖不但有损公正，更是对国家、世界**安全**的损害。

斯特兰奇还提出，安全保障、知识、金融、生产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四个要素。当然，这四个要素并未遍及所有的要素

三、贸易政治学的研究框架

肯尼思·沃尔兹提出，国际关系分析分为三个不同的意象（image）或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第二意象”即为国家。彼得·古勒维奇随之提出“颠倒的第二意象”，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被比喻为“黑匣子”“弹子球”——国家的内部是“漆黑的”“实心的”，不可见、也无需考虑的；国家是独立的（自主做出选择）、理性的（利益最大化）、统一的（国内意见一致）。但是，国家其实并非一个单一的行为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内层次是由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利益集团三个不同的主要行为体构成的。国内层次即国内的偏好结构对理解国际层次的合作与冲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国家是社会和体系两个层次之间的重要自变量或干预变量。

约翰·埃肯伯里提出了对外经贸政策分析的三个层次：

* **体系层次：**国际或体系层次将经贸政策视为本国与其他国家行为体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产物。
* **国家层次：**突出了长期存在的国内结构性关系和政府官员本身对政治制定的约束。
* **社会层次：**强调国内社会中主导集团或阶层的利益偏好，以及各利益集团或政党争斗对其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影响作用。

在这三个层次中，体系层次是相对最稳定的，社会层次则是相对最动态的。

经济社会学中有三个一般性命题：

1. 国家与经济并不是分析上的互不相干的自治领域，而是相互建构的活动领域；
2. 国家和经济都嵌入于具有独特的制度性结构的社会中，而且这种嵌入性对经济和政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3. 这种嵌入性是动态的，它经常因那些重构了国家与经济交叉方式的制度变革而改变。

（一）双层博弈理论

“双层”指的是在国际谈判中有：

* **第一层次（Level I）：**国际层次的谈判阶段
* **第二层次（Level II）：**国内层次的批准阶段

这两个层次虽然在理论上有所区分，但国际谈判往往是在这两个层次之间循环往复，最终达成协议。双层博弈理论的中心概念是“获胜集合”（win set，赢集），即在国际层次达成的协议能否在国内获得大多数选民的赞成。

获胜集合的规模取决于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分别与社会层次、国家层次、个体层次相关：

1. 国内层次选民间的权力分配、偏好和可能的联盟。
2. 国内层次的政治制度。
3. 国际层次的谈判者的战略。

双层博弈理论是一个简洁的理论，因而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现实中的谈判往往更加复杂。首先，政府本身可能有特定的利益偏好；其次，政府内部各个部门之间也可能存在利益差异。正因此，在国际经济谈判的不同问题领域，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未必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冲突。代理人并不一定是行政当局，也可以是能够对国际协议实施实际否决权的一个利益集团、行政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或是国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

由此，有学者就提出了双层博弈基础的第三个层次。Jeffrey W. Knopf指出，国内与国际之间有三种互动，分别是跨政府互动（trans-governmental）、跨国界互动（transnational）和跨层次互动（cross-level）。

* **跨政府互动：**一方或双方政府内部分化，位于各自政府内部的部分官员形成意愿同盟。
* **跨国界互动：**行政机构以外形成类似的意愿同盟。
* **跨层次互动：**一方的领导人与另一方的国内选民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二）国际关系中的“刺激/冲击-反应”模式

外压的产生、作用类似于国际谈判中的第一层次，A国政府将国内压力传导至B国政府，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谈判、申诉等形式进行利益交换，形成初步的协议。

与此同时，在B国国内，对于A国外压和AB之间初步或可能达成的协议，不同的利益集团、政府省厅、议员官僚协调立场，对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上述协议形成合意，从而缓解或进一步激化原有的外压。

这两个过程相互交织，在外压和内压之间形成了动态的博弈。

第二讲 贸易与新现实主义

2025.9.25

一、现实主义权力视角下的国际贸易

我们知道，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包括：

1. 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行为体；
2. 国际事务在本质上是冲突性的，追求权力是国家的根本目标，权力本身既是一种目的，也可以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3. 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体，寻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可见，现实主义解释了国际关系的主体、背景及其行为（何者在何情况下做什么）：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追求权力的最大化。

二、贸易与霸权兴衰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把公共产品理论引入国际关系，他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来承担“公共成本”。在研究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基础上，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了“霸权稳定”的论点。

（一）霸权稳定论的提出背景：大萧条

大萧条即1929年至1933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带来了资本短缺，资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没有市场必然使工厂关闭，货物越少，货物运输也就越少，这必然会危害船运业和造船业。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

这次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国家。对千百万人而言，生活成为吃、穿、住的挣扎。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剧恶化世界经济形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大萧条中，美国是第一个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于1930年6月17日经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将2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在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斯姆特-霍利法案是导致美欧之间贸易规模从1929年的历史高位急遽衰退到1932年历史低位的催化剂——这次衰退伴随着的是大萧条的开始。